

# 宋庆龄领导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齐超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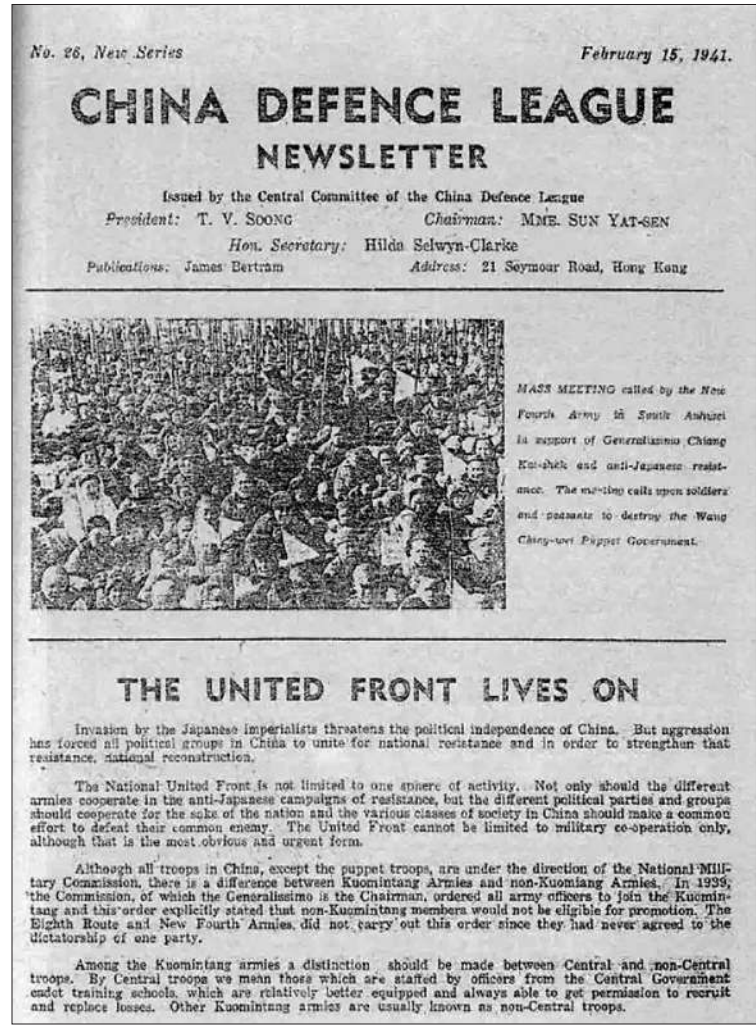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战时物资与经费。更重要的是,宋庆龄通过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宣传新四军抗战成绩,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新四军的作战活动,也了解到新四军最真实的生活状况。皖南事变爆发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向海内外揭露事变真相,引起世界舆论关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和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很快被粉碎。

## 公开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早就有所察觉。1月14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重庆当局发表宣言,并向民众公开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柳亚子当即拟就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一起署名。宣言写道:“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唯欲我抗战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有研究指出,起草这个宣言时,宋庆龄尚不知道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此宣言未能在香港和大后方公诸报端,但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久,宋庆龄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立即与何香凝、陈友仁于1月18日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其反共行径。通电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 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月19日,保卫中国同盟召开会议,由廖承志报告皖南事变真相,并宣布“延安的抗议”,引起了全体与会人士的同情激愤。与会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纷纷表示,立即联络本国媒体,公布事变真相。保卫中国同盟之所以第一时间选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对皖南事变的报道

择向国外公布此次事变,主要源于国民党对皖南事变事实的歪曲以及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事变发生后,面对中共的抗议,国民党发布通令,将责任归咎于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发出指令,要求各报社必须原文转载国民党对于此事的通令,不许更改。重庆《新华日报》的稿件全都需要事先经过检查,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全部被扣压。国民党中央还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不仅限制电讯内容和发电单位,而且还严格限制采访对象和采访活动,连采访证上都严格规定了采访时间、地点、对象。

埃德加·斯诺获悉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气愤至极,宣布“一旦把事情确实经过弄清楚,我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报道出去”。斯诺动用关系将关于皖南事变的电讯稿发出,并刊载于《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与此同时,斯诺还第一次报道了国民党封锁边区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在西北地区所亲眼看到的事态发展。斯诺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封锁新闻的幻想,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斯诺返回美国。回国前,宋庆龄对他说了“你会回来的……你是属于中国的。”尽管斯诺被迫离开中国,但他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从1941年1月开始,在《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1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5期发表了《中国的新四军》一文,文中特别提到了“直到最近得到撤往北方的命令之前,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对侵略者发动了最强有力的广泛抵抗。尽管它在以往几个月里同其他中国部队之间发生了纠纷……目前长江流域的局势极不明朗。”2月25日,又发表了题为《统一战线继续存在》的文章,向外界报道了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的谎言:“中央政府内外的亲日派散布混淆视听的谣言,企图将一切爱国分子一律加以共产党的罪名,把独裁假扮成统一。‘新四军事件’就是这一伎俩的最近例证之一……甚至当新四军已经遵从军令之后,其一部仍在皖南遭到伏击和屠戮。”4月1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期刊载了一篇《中国内地一位通讯员的公开信》,进一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以及国民党对于民主人士的迫害。信中特别指出:“进攻新四军的结果,是把这一战略地区的大部分让给了日本人,并把全国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局否认新四军事件有任何‘政治性质’,并想避免被指责为破坏统一战线,于是着重迫害那些自由人士和进步团体。”信中还转引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项条件。

## 引发各界关注,形成舆论压力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由于报道内容的真实、及时、全面,广受

# 红二、红六军团歼敌板栗园

贾晓明

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于11月挺进湘西地区,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蒋介石闻讯后,下令调集湖北、湖南两省约11万人的国民党部队,交给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指挥,对根据地发动“会剿”。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上级“实行运动战,选择敌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精神,对敌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消灭了大批来犯之敌。蒋介石接连损兵折将,又从江西调来了八十五师等部队交给徐源泉,令他“务必剿灭”红二、红六军团。徐源泉的兵力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因屡遭红军打击,已经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所关心的只是保存实力和地盘。为防止红军再入鄂西,7月30日至8月1日,徐源泉先命令两支支队向沙道沟推进;又命令第八十五师经宣恩西南的晓关往李家河;命令暂编第四旅一部占领水田坝、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接应八十五师。红二、红六军团通过截获国民党

军八十五师的电报,掌握了敌人的调动和配置情报,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经研究后认为,敌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其行军路线沿途山高林密,不但部队运动困难,侦察搜索和展开也很困难;而鄂西其他敌军都已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其间空隙很大,有利于红军的隐蔽穿插;因此决定:利用敌八十五师的弱点,集中主力,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为麻痹国民党军并给其造成错觉,8月2日,红军一部突然向沙道沟附近伴动进军。徐源泉得到报告后果然中计,认为红军准备打击其派往沙道沟的两支部队,因此慌忙下令这两路部队停止行动,严加戒备。行进中的国民党八十五师也得到红军向沙道沟方向进军的情报,他们判断红军打击的目标不可能是自己,于是放心大胆地按原计划向李家河继续前进。8月3日凌晨,进至沙道沟附近的红军突然改变方向,沿着一条山中的捷径折向西南方向,一路疾进,于3日11时赶在国民党八十五师之前

到达了板栗园东南的福福田谷地埋伏起来。该地位于板栗园与李家乡河之间,是一个长约15里、宽不足1里的狭长谷地,两边山势陡峭、森林茂密,是理想的伏击战场。这一带也是红二军团战斗过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因此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封锁消息,传递情报,掩护、配合红军的行动,因此红军行踪完全没有暴露。敌八十五师进至板栗园后,看见赶集的群众来来往往,感觉“一切正常”;加之侦察分队从李家河返回后报告说,板栗园至李家河沿途道路畅通,一二三旅也已经抵达李家河一线。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据此判断“红军距离尚远”,于是命令部队迅速赶往李家河,和友军会合。12时左右,敌八十五师按五〇一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及五〇五团的行进次序,进入伏击圈。红四师首先向敌人开火,将敌五〇一团紧紧压制在谷底。此时,红六军团十七师已赶到战场,从红四师的侧翼加入战斗。红军随即居高临下发起多路突击,将敌人截成数段。敌五〇一团很快被歼灭于三灵沟、谭家岩地区。敌师长谢彬闻讯后,立即命令残部匆忙展开——五〇五团主力向巴里核高地进攻,特务营、五〇五团一部向莫家坡高地进攻,企图夺取制高点后固守待援。当敌特务营、五〇五团一部爬到距离莫家坡山顶40米处时,遭到捷足先登的红六师的迎头痛击,很快被全部消灭。敌师长见状,只得一面率残部收缩到在巴里核高地一个土圈子里负隅顽抗,一面向李家河、沙道沟等地的敌人求援。但各处敌人害怕红军围点打援,加之和红十五师派系不同,均不发表救援。红二、红六军团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命令参战各部协同发起猛攻。激战至深夜,红军发起冲锋,将敌师长击毙,残敌纷纷举手投降。战至23时,红军全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另两个团及1个营,俘虏千余人,缴获轻机枪千支、迫击炮6门、弹药600多箱。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返回根据地。此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二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 九一八事变后的丁文江

龙悦

知名社会活动家、地质学家丁文江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文,早在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所认识。此后,随着对日本认识的逐步加深,丁文江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更是担忧。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丁文江接连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告诫国人“全面的侵华战争迟早要发生”,同时指出,“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长期抗战拖垮日本,应是可行的良策”。丁文江还向北平各高校青年学生发表演讲,呼吁青年积极参与“抵抗日本,收复失地”的斗争,同时指出,“抗日救国……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丁文江还接连发表文章,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表示不满,认为国民党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中存在“很大的失败”,“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他还力劝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共同抗日,并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的建议,蒋介石不予采纳。

不久,国民党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丁文江被聘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设计专门委员。其间,丁文江提出:“与其以国防为重,不如以经济为目的。前者虽是直接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后者虽是间

# 九十四师丹山攻坚

尹向东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山东军区的指挥下,发起了解放青岛、即墨的战役。5月3日,战役正式打响。外围战斗结束后,解放军各参战部队经过几天休整,继续兵分三路,自5月26日开始向守卫青岛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作为中路部队的解放军第三十二军九十四师主力部队在连克敌人驯虎山、后旺山、蝎子山等重要阵地后,乘胜追击逃敌至丹山山下。丹山号称“进出青岛的门户”,是国民党守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敌人的两个加强连。为守住丹山,敌人在战前曾强征大批民工,在丹山从山下到山顶修筑了大量水泥碉堡、暗堡和交通壕等防御工事,还特别在险要的位置上修筑了双层暗堡,几乎将丹山“都掏空了”。九十四师师长将夺取丹山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二八〇团、二八一团。5月31日拂晓,九十四师先头部队向丹山河附近的敌人部队发起攻击,将其击溃。上午8时,丹山战斗打响。二八〇团指战员从北、东北方向越过丹山河向守敌发起冲击。在连续炸毁敌人九座碉堡后,攻击部队受到了敌人暗堡交叉火力及侧射火力的阻拦,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师首长得到报

# 苏中战役“四中队”屡建奇功

吴小龙

1945年11月10日,新四军华中军区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担任司令员。粟裕历来重视侦察、情报工作,下令组建技术侦察队伍:把新四军调研室的部分干部、苏中军区的部分干部、浙浙军区的部分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处,代号“四中队”,由朱诚基担任处长兼政委。为了扩充“四中队”的力量,朱诚基从苏北、苏中地区选调近百名学员,集中在淮安训练。谭震林也派人通过地下党从敌占区搞来了一批装备给“四中队”。为了加强建设,粟裕经常把“四中队”的驻地安排在靠近指挥所的地方,随时向他们提出要求、询问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的和平协议,悍然挑起内战。由于苏中解放区位于整个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南京、上海一线隔江相望,蒋介石派12万大军进犯。粟裕、谭震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苏中同国民党军展开较量。战斗打响后,朱诚基带领“四中队”采用多种手段,多次侦查、破译敌人的作战部署情报,为粟裕等华野首长提供了一手信息。7月10日,“四中队”得到了国民党军集结四十九、八十三、二十五3个整编师及整编九十九旅,准备在三

《史海观澜》

《史海观澜》